

清代揚州 學術研究

上冊

主編 祁龍威
林慶彰
編輯 黃智明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清代揚州 學術研究(上)

主編 祁龍威
林慶彰
編輯 黃智明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圖一：一九九九年一月三十日，與揚州大學人文學院洽談學術合作，舉辦「學術交流會」（黃智信攝）



圖二：二〇〇〇年四月三至五日，由揚州大學人文學院主辦「海峽兩岸清代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與會代表留影



圖三：「海峡两岸清代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開幕式
(蕭開元攝)



圖四：上海社會科學院湯志鈞教授在「研討會」上發言
(蕭開元攝)



圖五：臺灣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教授在「研討會」上發言
(蕭開元攝)



圖六：「研討會」與會學者 (蕭開元攝)



圖七：「研討會」閉幕式（蕭開元攝）



圖八：臺灣與會學者在「研討會」後留影



圖九：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參觀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圖中為庫房所藏印版（黃智信攝）



圖十：一九九九年二月一日，赴高郵參觀「高郵王氏紀念館」（張連生教授攝）



圖十一：一九九九年二月一日，在「高郵王氏紀念館」內合影（黃智信攝）



圖十二：位於揚州東北郊上方寺西北葉家橋的汪中墓（黃智信攝）



圖十三：位於邗江縣黃珏鎮南首的焦循墓（黃智信攝）



圖十四：位於揚州市區毓賢街8號的阮元故居（黃智信攝）



圖十五：位於邗江縣槐泗鄉永勝村的阮元墓（黃智信攝）



圖十六：「研討會」後遊「瓜洲古渡」（蕭開元攝）

祁 序

祁龍威*

海峽兩岸學者合作研究清代「揚州學派」，產生了第一本論文集。它收集臺灣、揚州和北京、上海等地三十餘位專家的作品，內容涉及對清代乾嘉漢宋之爭、吳皖揚分派以及揚州學者關於經學、小學、史學、子學、地理、戲曲等研究的探討。這是一本絢麗多彩的論文集。

清代樸學的興起，乃是對明季士大夫「空談心性」的否定。懲明亡之失，顧炎武首標「知恥博文」之旨，鼓吹「理學即經學」，引導學者舍宋明語錄而返求「內聖外王」的真道於《六經》，遂開有清一代通經致用的樸學之風。同時，閻若璩辨偽《古文尚書》，胡渭斥河圖洛書……，其鋒芒均指向宋明理學的「空疏」。乾嘉諸儒繼起，篤志於研經，其它諸學並興，著作如林，人才輩出，於是在中國學術史上，出現了眾星燦爛的「乾嘉學派」。

乾嘉諸儒在復興「古學」的口號下，創造新的文化。先是，以元和惠棟為宗師的「吳派」，力求恢復自魏晉以降被顛倒廢棄的漢

* 祁龍威，揚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儒對諸經的訓詁，其徒頌之，謂使千載沉霾，一朝復旦。繼之，以休寧戴震為宗師的「皖派」，堅持由字以通辭，由辭以明道，力求恢復孔孟之義理。再繼之，以江都焦循、儀徵阮元和曾作揚州寓公的歙人凌廷堪為主要代表的「揚州學派」，力求恢復三代的人倫典則。三者相繼，創建清代的經學。

乾嘉學派擅長考據，宗法許鄭，故稱「考據學派」。乾嘉經學又稱「漢學」，以區別於「鑿空說經」的「宋學」。吳皖揚三派雖都屬「漢學」，但頗有差異。吳派唯漢代經師的家法是從，這是真正的「漢學」。皖派謂漢儒也有傳會，不能盲從，提倡「實事求是」。^①惠、戴相繼，使考據之學達於高峰。於是揚州學人聞風興起，先於焦、阮者，有汪中、王念孫等。汪中為李惇撰墓銘云：「是時古學大興，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咸為學者所宗。自江以北，則王念孫為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劉台拱繼之。」^②焦循為李惇作傳亦云：「乾隆六十年間，古學日起，高郵王黃門念孫、賈文學稻孫、李進士惇實倡其始，寶應劉教諭台拱、江都汪明經中、興

① [清]戴震：〈與某書〉云：「漢儒訓詁有師承，亦有時傳會；晉人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為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在其所棄。」見《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第6冊，頁495。〈與王內翰鳳喈書〉云：「六書廢棄，經學荒謬，二千年以至今……僕情僻識狹，以謂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為株守。」見同書，頁278。以上表明戴震既貶宋學，又不株守漢學的態度。

② [清]汪中著，葉純芳、王清信點校：《汪中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年3月），頁256。

化任御使大椿、顧進士九苞起而應之。」^③以上諸賢，皆響應吳皖之學而起，成為「揚州學派」的先驅者。阮元為任大椿作〈弁服釋例序〉云：「元居在江淮間，鄉里先進多治經之儒。」他在列舉上述七賢後又云：「皆耳目所及，或奉手有所受。」^④其時「漢學」也就是考據學已日益暴露其負面。於是「揚州學派」的奠基者焦循、阮元和凌廷堪，聯袂而起，枹鼓相應，力糾「漢學」末流之弊，使「揚學」成為乾嘉樸學的殿軍。

焦循作〈述難〉五篇，其四專斥惠氏株守「漢學」，「唯漢是求，而不求其是。」^⑤他〈與王引之書〉指名批評惠棟，「大約其學拘於漢之經師，而不復窮究聖人之經，譬之管夷吾，名曰尊周，實奉霸耳！」^⑥焦循深惡當時考據家的盲目信古之風，「以時代言，則唐必勝宋，漢必勝唐；以先儒言，則賈、孔必勝程、朱，許、鄭必勝賈、孔。凡鄭、許一言，皆奉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詞。」焦氏深憂，「此風日熾，非失之愚，即失之偽。」^⑦他大聲疾呼，有經學而無考據學，必也正名。

凌廷堪〈與胡敬仲書〉痛斥當時所謂「漢學」者的虛偽學風：「第目前侈談康成，高言叔重者，皆風氣使然，容有緣之以飾陋，

③ [清]焦循：《雕菰集》（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本，1985年），第6冊，頁343。

④ [清]阮元：《學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243。

⑤ [清]焦循：《雕菰集》，第2冊，頁105。

⑥ 賴貴三編著：《昭代經師手簡箋釋》（臺北：里仁書局，1999年），頁208。

⑦ 同前註，頁201。

借之以竊名。」對惠、戴之學，「襲其名而忘其實，得其似而遺其真。讀《易》未終，即謂王、韓可廢；誦《詩》未竟，即以毛、鄭爲宗；《左氏》之句讀未分，已言服虔勝杜預；《尚書》之篇次未悉，已言梅賾僞古文，甚至挾許慎一編，置《九經》而不習；憶《說文》數字，改《六籍》而不疑；不明千古學術之源流，而但以譏彈宋儒爲能事……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⑧凌廷堪又反對漢學家狹隘的門戶之見：「且宋以前學術屢變，非『漢學』一語可盡其源流。即如今所存之《十三經注疏》，亦不皆漢學也。」^⑨也就是說，孔孟經義不盡在於漢儒訓詁。

阮元在杭州詁經精舍，督率諸生發明孔子志行，以糾正當時重「書數」輕「志行」之偏。

焦循等雖然猛烈抨擊「漢學」流弊，但是他們的步伐仍然沒有脫離「隆漢貶宋」的軌道，批判宋明理學「援禪亂儒」，不遺餘力。與前人所不同者，焦循等能及時總結漢學流弊的經驗，發明和充實面向經世的治學方法。

凌廷堪揭示學術「閱數百年而必變」的規律：「其將變也，必有一二人開其端，而千百人嘩然攻之。其既變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從之。夫嘩然而攻之，天下見學術之異，其弊未形也。靡然而從之，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始生矣。」^⑩他攘臂高呼，要求矯「漢學」之弊。

⑧ [清]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03—206。

⑨ 同前註，頁204。

焦循發揮《論語》「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的深意，闡明學經之道。他〈與劉端臨教諭書〉云：「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虛，庶幾乎學經之道也。」^⑩

阮元強調，稽古之學，當用之於政事，所作〈漢讀考周禮六卷序〉云：「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末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⑪

所有這些，皆言惠、戴所未嘗言，這與焦循《易》學三書、凌廷堪〈復禮〉三篇、阮元〈論仁〉等面向人倫日用的研經著作，都超越了吳皖學者的陳迹，從而確立了「揚州學派」的歷史地位。

我嘗竊論，吳、皖、揚三派的劃分，顯示了乾嘉經學連續發展的三個階段，這是學術內在的脈絡。^⑫藉此序文，進一步申此淺見，以冀拋磚引玉，把對清代「揚州學派」的研究深入下去，並把研究的重點引向當時學術文化的中心——經學。除焦、阮、凌等的經學成果外，對於寶應劉氏之於《論語》、儀徵劉氏之於《左傳》等，我們都要研究。

清代「揚學」以博通著稱，其內容博極「四庫」。有些經學

⑩ [清]焦循：《雕菰集》，第4冊，頁215。

⑪ [清]阮元：《學經室集》，頁241。

⑫ 祁龍威：〈清乾嘉後期揚州三儒學術發微〉，《揚州大學學報》第2期（2000年3月）。

家，往往兼治史學，如任大椿作《吳越備史注》、劉文淇作《南北史注》，等等。尤其是對文化史的董理，碩果累累。汪中作〈荀卿子通論〉、〈荀卿子年表〉、〈墨子序〉、〈墨子後序〉、〈老子考異〉，開拓「子學」史研究的領域。江藩撰《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阮元纂《疇人傳》，均屬不朽之業。如果上溯王懋竑撰《朱子年譜》，下迄劉師培編《經學教科書》，則清代揚州學人對文化史的著作，可謂源遠而流長矣。

遠在隋代，曹憲傳「《文選》學」於江淮間。「選學」治雅訓、詞章於一爐，乾嘉揚州學者受其薰陶，彬彬稱盛。汪中、凌廷堪均善駢文，其名作為世傳誦。而焦循、阮元之文學理論，也影響及於近代。

乾嘉揚州學者好收藏金石，辨其文字。汪中蓄古錢二百九十有七，其古金多是三晉時物，刀布圓法，迨漢而止，考其文字，可以訂正六書，益人神智。阮元纂《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兩浙金石志》及《山左金石志》，用以補經史，訂《說文》。最近，揚州發現《古銅鏡錄》，係焦循未刊之作。

略舉數例，以見「揚學」的寶藏極為豐富，需要海內外同行分工合作，長期研究。

我任教揚州大學及其前身揚州師範學院逾四十年，常思約集同好之士，合作研究清代「揚州學派」，以興樸學之風。但直到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始告起步。一九八八年，我校舉行「揚州學派」研討會，印行了《揚州學派研究》一書。相隔不久，僑居美國的史學老前輩黎東方教授回揚州探親，感謝他把此書帶到臺北，成為我校與海峽對岸同仁交流「揚州學派」研究成果的起點。一九九九年

一月末二月初，林慶彰、蔣秋華、張壽安、賴貴三、楊晉龍、黃智信六位專家從臺灣跨海來揚，我們歡聚一堂，座談關於清代「揚州學派」的若干問題，並協商合作研究的步驟，由此開始資料交流，並催生了今年四月初，在揚州舉行的「海峽兩岸清代揚州學派學術研討會」。一位學者賦詩有句云：「大義文中出，微言席上呈。」另一位也即興得句云：「研經思太傅，修楔訪虹橋。」這些詩篇生動地寫出了兩岸文人雅集的盛況。這本論文集就是雅集的結晶。大家同意賴貴三兄的提議，取名《清代揚州學派研究》。今後可能還有續集、三集……，因為我們的合作是長期的。

清代揚州學人之所以能夠創造優越的學術文化，這是和他們的高風亮節分不開的。以對訓詁學、音韻學作出卓越貢獻的王念孫為例，他喪妻後居北京數十年，「塊然獨居，不畜妾媵，酒食遊戲，無所征逐，澹然安之，不厭岑寂。」外任河道時，有人「見其廳事樸陋，寢室中唯古書數架而已。」^⑮這在腐朽的官僚群中，幾如鳳毛麟角。學者讀書至此，能不肅然起敬，掩卷深思！

我祝願，揚州將有群賢繼往哲而起，敦行績學，廣師多友，在棲靈塔下，瘦西湖畔，這塊風景如畫的土地上，為宏揚文化和哺育英才而弦歌不息。

二〇〇〇年四月 祁龍威 於揚州大學

時年七十有八

⑮ [清]王引之：《石臞府君行狀》（清道光12年木刻本，揚州大學敬文圖書館藏），頁25—26。